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八七期 ——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1d)

| | | |
|--------|---------------------------------|-----|
| 【国史论衡】 | 新松恨不高千尺 ——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求疵札记 | 何 蜀 |
| 【当事者言】 | 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 | 杨银禄 |
| 【人物春秋】 | 程世清沉浮录 (下) | 李意根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国史论衡】

新松恨不高千尺
——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求疵札记

• 何 蜀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几十年来，大陆官方审定出版的文革“正史”，只有薄薄的一本《“文化大革命”简史》，而这本《简史》的两位作者之一的金春明教授独立写作的另一部《“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竟在官方查禁之列。现在终于又出版了一套由学者独立写作的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在内的国史，确是令人高兴的。

对于这套国史的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以下简称《难》），《记忆》此前发表的丁东和阎长贵两文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这方面笔者就不多说了。《难》的两位作者，一位是老朋友，另一位虽无联系交往，但也应算是同道。“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以文会友，还是直说一点吹毛求疵的意见吧，以利于相互切磋，促进文革史的研究和写作。

◇ 上层与下层

官方审定出版的那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曾被徐友渔指责为“帝王将相史”。此说虽然

有些刺耳，但是确实道出了一个官史的通病，即过多注重领袖人物及执政党中央的决策与运作，以及高层人物间的争斗，此风愈演愈烈，以致现在许多地方党史甚至地方史都变成了执政党的会议史、决议史、文件史。而香港中文大学这套国史，按总序所说已“开始注意到支配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与重大社会事件的互动，特别是这些事件如何从中央决策到地方，再到基层展开的”。本卷作者在导言中也认为：上层与下层“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对立，不同时期不同层面，联系与对立侧重不同，从这个角度反思‘文革’显然要困难得多。但舍此无法理解这场政治运动为什么确实是‘史无前例’而有那么多民众大规模参与，为什么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不休而欲罢不能。”

不过，看一看全书的章节结构，就会知道作者离自己设定的这个目标还有一些距离。全书共分十章：

第一章，林彪事件后的中国政局；
第二章，中美关系缓和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
第三章，毛泽东在选择新的接班人中寻求平衡；
第四章，“抓革命、促生产”模式下中国经济的跌宕起伏；
第五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批林批孔运动；
第六章，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斗争；
第七章，动荡中的社会、文化与思潮；
第八章，不摸脉的邓小平 1975 年整顿；
第九章，“批邓”把民众推向公开造反；
第十章，“下不为例”的粉碎“四人帮”；

从这十章及各节的标题设置即可看到，除了第一章（主要是第一节“林彪事件的扩散、传达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应”和第二节“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崛起”）、第四章（主要是第四节“‘农业学大寨’压迫下的 1970 年代前期农村经济”）、第五章第三节（主要是第一小节“各地重新掀起造反浪潮……”部分）、第九章（主要是第三节“‘四五’运动：真正的群众造反”）写到一些下层社会情况外，只有第七章基本上是以整章篇幅较多地反映了下层的“社会、文化与思潮”。其他各章都是写上层（而且主要是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等很少几个人之间）的决策与争斗。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样的内容，纯属高层权力斗争与领袖谋略问题，单独列入一章的标题中，是否显得过重？

此外，作者在书中特别写了一些“带有专题性的考证”，据作者在导言中举出的有：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经考虑过哪些人当接班人？
周恩来为什么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做痛苦的历史反省？
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吗？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越南先后翻脸的原因是什么？
谭甫仁中将被刺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少将为什么被逼死？
公安部长李震少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毛泽东有没有因《红都女皇》事件而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
周恩来对美国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而被毛泽东下令批判？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要防备谁？
批林批孔是毛泽东还是“四人帮”发动的？
邓小平的 1975 年整顿是不摸脉还是不想摸脉？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的决策还是“四人帮”的挑拨？

“一生中做了两件事”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吗？
谁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
“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的阴谋伪造吗？
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员参与和预知了抓“四人帮”的行动？

从作者重点列出的这十七个问题（或者说专题）看，除了谭甫仁被刺杀一案涉及下层社会原因（书中对此有所论述）外，全是高层“宫廷斗争”的内容。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关注的重心所在。

其实，同样是这些问题，如果作者能把视角转移一下，多关注一些下层，是可以找到另一些值得记叙和论述的专题的，比如，在最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走后门”之类“不正之风”怎么竟会泛滥成灾引起极大民愤？为什么在反对“走后门”问题上民众与毛泽东想不到一起？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给各地的社会局势和民众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批林批孔几乎引起新的造反运动却又未能像文革前期那样有众多民众参与？为什么民众在那几年里对“政治谣言”的传播和炮制会有那样大的兴趣？等等。

此外，书中称“谭甫仁中将”、“王良恩少将”、“李震少将”，都不妥当，因文革之前一年已经取消军衔。王良恩和李震两人之死属于同一类型（都是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作为两个专题，似嫌重复。文革中高级将领之死，是可以找出另外一些更能反映时代风云的专题的，比如同样有过少将军衔的吴自立，文革前就因组织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和领衔创作电影剧本《怒潮》而被认定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其专案调查组由贺龙负责），被撤销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职务。文革中，因支持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肯定的湖南造反派湘江风雷，甚至一度住在湘江风雷一派的武斗组织青年近卫军总部“帮助指挥”（参见陈益南回忆录《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又被周恩来斥为“黑手”（与他同时被打成“黑手”的还有另一位同样有过少将军衔的老红军蔡爱卿），遭到反复揪斗、关押审查后，于1975年含冤去世。吴自立的命运，应该是更能反映出当代国史而不仅仅是高层权力斗争史的一些侧面的。

◇ “大革文化命”与文艺史

文化大革命又被称为“大革文化命”，它从毛泽东委托（毛十分诡谲地强加于人，称之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亲自改定其《纪要》的发表从而展开文艺大批判开始，文艺领域成为文革中首先遭难并饱受摧残的重灾区。但在《难》中，涉及该历史时期文艺状况的，只有第七章第一节中的第二小节“官方创作理论体系控制下的极端政治化文化”和第二节中的第三小节“‘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这也许与两位作者分别专长于对外交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而对文艺史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关。不过，作为一部完整的国史，还是应该对各个不同领域的历史情况都有足够篇幅的记叙和论述，轻重不宜相差太悬殊。因为对文艺方面着笔太少，所以在《难》中不易看出从批林到批邓的五年间文艺方面起伏演变的历史脉络和走向。

作者在这一章里，自拟了一个不准确的概念：“红卫兵文化”。作者说：“‘文革’头三年，包括文学、电影、绘画、诗歌等等旧文化几乎都被砸烂，代之而起的是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文化，我们将其称为红卫兵文化。”（442页）其实，作者既已说了这是“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文化”，何必又去另造一个“红卫兵文化”的概念呢？这一概念显然不如前一个概念更清晰、准确。因为对“红卫兵”一词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可以理解为各类红卫兵的总称，也可以理解为1966年“红八月”横行京城、首开打、砸、抢、抄、抓甚至滥杀无辜之风（而且后来并未被当作“三种人”清理）的那批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即“联动”一派）。也可以理解为以首都高校“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还可以理解为后来成为学校中取代共青团

组织的官办“群团组织”红卫兵。但无论如何理解，它们都有一个不容改变的内涵：学生。这个概念显然不能包括工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干部、科技工作者、各类学校教职员、财贸系统职工、军事院校学员、部队文体单位人员、开展“四大”的军区机关指战员、农民、街道居民等不同社会阶层中的造反派。提到文化大革命就只想到红卫兵，只知道红卫兵，那是一些外国人的简单思维，作为中国人写自己的国史，用不着去迎合外国人的思维习惯。

◇ 《艳阳天》还是《金光大道》？

《难》的第七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讲到“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小说、诗歌、文学理论”时，分别列举了这三个方面的三部代表作品：浩然著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张永枚著诗报告《西沙之战》，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但是，作者在介绍《金光大道》时，却不知怎么把内容介绍成了浩然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了。在介绍了浩然的简历和《艳阳天》前两部内容后，作者说：“1971年出版了《艳阳天》第三部《金光大道》，成为‘文革’时期绝无仅有的巨幅作品。”“这部小说的阶级斗争模式表现得更加清晰……”并提到“萧长春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阶级异己分子、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即走资派的前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地主马小辫”……最后说：小说因语言的乡土特色和时代生活气息等“使得《艳阳天》在‘文革’时期模式作品之中，超出了一般机械的简单教条图解生活的方式，在当时文学百花凋零的情况下，还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447—448页）

读了书中的这些介绍，凡是读过浩然这两部小说或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的人都会感到莫名其妙。讲《金光大道》怎么会扯到萧长春了？《金光大道》的主角是高大泉呀！——后来人们正是根据“高大泉”这个名字的谐音评论文革时期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浩然对此还颇为得意，认为“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275页）而且，《金光大道》怎么会成了《艳阳天》的第三部？《艳阳天》是浩然创作于文革前的作品，小说三卷（不是三部）分别于1964年9月（作家出版社）、196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金光大道》是浩然在文革中从1971年开始创作（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完成）的作品，第一、二部分别在1972、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难》这样一部国史中，对一部小说花了超出一页的900多字的笔墨来进行介绍，本身就已经有些欠妥，更何况又把内容完全介绍错了。这样的疏忽显然是不应有的。

◇ 关于户县农民画

在谈到美术方面情况时，《难》着重介绍了陕西户县农民画。也用了超出一页的900余篇幅讲“值得一提的是陕西户县农民画的崛起”（450页）。然而，在这样大的篇幅中，却看不到作者对这个在百花凋零的文革中“崛起”的畸形美术现象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反思，而是基本上采用了文革时期的宣传报道材料，对其进行片面的讴歌。其实，只需稍稍想一想，就应该明白，在文革风暴摧残文艺百花园地之后，在当局不断发动“反复辟”、“批黑画”的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能“崛起”一批农民画，是正常的现象吗？就在户县农艺画在北京展出（1973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和喉舌媒体大肆炒作的时候，评法批儒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江青等人为两位土耳其音乐家访华演出的曲目选择问题挑起一场批判“无标题音乐”的闹剧，毛远新按照“四人帮”的指示在辽宁布置批判小说《生命》（发表于1972年沈阳《工农兵文艺》创刊号），江青等人还相继发起了批“黑画”和批判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特别是在“批黑画”恶浪中，陕西省的著名画家、“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石鲁，再次遭到批

判。本来在此之前，为了能让陕西省拿得出参加全国美展的像样作品，陕西省革委不得不将已经被打倒多年的“黑画家”石鲁“解放”出来，任命为省革委文化组美术顾问，但是，在“批黑画”恶浪中，陕西省再次将石鲁抛出作为批判靶子，同时遭到批判的还有二十多位老画家，如赵望云（其画作被斥为“黑山黑水”、“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何海霞（其画作《严陵月色》题词“与石鲁、李琦月夜泛舟……”被斥为“借以寄托他们对文艺黑线及黑线统治下昔日盛事的无限眷恋之情”）、方济众（画延安的画作也挨批）、叶访樵（所画花卉下一怪石被说成像蒋介石的头，斥为“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招魂”）、郑乃（王光）（所画石下一鸡，被诠释为“危鸡（机）四伏”，斥为“林彪反党集团恶毒诬蔑大好形势的反革命谣言的形象图解”）等。省革委还调集了西安大专院校政治、文学、历史、美术等方面的数十人，对石鲁“黑画”进行批注，编出一大本《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举办了批判石鲁“黑画”的专题内部展览，省报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批判文章，并在西安人民剧院召开了“深批克己复礼痛击美术战线文艺黑线回潮”的大会，狠批“文艺黑线回潮的急先锋、黑画家”石鲁……（张毅《石鲁传》，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329—337页）就是这同一个省革委，在这同一时期，将户县农民画作为其政绩和文化大革命“丰硕成果”的体现大肆炒作，这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吗？

在段景礼著《户县农民画沉浮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中，对户县农民画如何“在‘为政治服务’中成长”，如何得到政治和艺术的双重“辅导”，如何举办“阶级斗争展览”，如何“从‘红画兵’到‘学习班’”以及“‘红画兵’批‘黑画’”等等，都有详细的调查和冷静的反思。然而，这些在《难》的这部分内容里，却一点也看不到。而《难》这套国史是定位于“从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的（见金观涛《总序》），这显然有违作者和编者筹划这套国史写作时的初衷。

◇ 《一只绣花鞋》还是《一双绣花鞋》？

在第七章第二节第三小节，谈到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中的“民间流传手抄本小说”时，《难》着重介绍了《第二次握手》和《一只绣花鞋》两本书。令人不解的是对《一只绣花鞋》的介绍。因为此书近年曾引起一桩轰动一时的文坛公案。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流行的手抄本是《一双绣花鞋》，不是“一只”而是“一双”，作者是原重庆化工局干部况浩文（后为重庆市外贸局长），1958年，况浩文根据他在公安部门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共执政初期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历，写成了中篇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投稿给重庆出版社，不幸责任编辑王文琛被打成了右派，无人处理此稿。况又把稿子投到了《成都晚报》。《成都晚报》主编陈柏林、副刊组长林开甲都在重庆工作过，一致认为作品故事生动，文笔不错，特请老作家沙汀审读。沙汀读后也很感兴趣，还请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秦传厚看看，从公安政策、保密规定等方面把把关。此稿被峨眉电影制片厂得知，导演张波与况浩文联系，邀其改编为电影剧本。后因峨影厂“下马”，张波调珠江电影制片厂，又从珠江厂向况约稿，并找重庆市长任白戈给况批了创作假。剧本改好后由重庆市文联打印了70份。重庆著名评书艺术家徐（京力）看到后，建议改名为《一双绣花鞋》并编成评书。但此时正遇上贯彻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说评书与拍电影都被迫“下马”。但故事却在川东民间广为流传，文革爆发后，此稿被批判为“毒草”，况浩文为此吃尽苦头，重庆文联有关干部也因“扩散毒草”问题遭到追查。但是越批判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因此《一双绣花鞋》又变成了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文革结束后，重庆文联《红岩》杂志复刊，第一期即推出电影文学剧本《在茫茫的夜色后面》。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定名为《雾都茫茫》，该剧还被改编为话剧和川剧等十多个剧种演出。

不料，2000年9月，被标榜为“中国当代恐怖小说先驱”的《一只绣花鞋》在书商的大肆炒作下出版，作者张宝瑞被称为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著名诗人汪国真在为

该书所写的序中称：“知名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文学《一只绣花鞋》终于问世了……在‘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和手抄本就是《一只绣花鞋》——‘文革’后，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北京各媒体都大篇幅宣传了这本《一只绣花鞋》。

问题就出在“一双”与“一只”的名称相似及汪国真序中那句“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其实二者除了故作神秘的开头（《一双》是老更夫发现春森路一黑楼上的人影和一双绣花鞋，《一只》是老清洁工发现教堂小楼上的人影和一只绣花鞋）及几处情节相似外，主要内容并不相同。《一双绣花鞋》讲的是中共特工打入国民党高官府上窃取国民党准备对陪都重庆实施大破坏的绝密计划，在此过程中与国民党高官之女及府上丫环（中共卧底）发生三角恋爱纠葛，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任务。而《一只绣花鞋》讲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中共内部搞破坏。中共特工设法与梅花党党魁的女儿邂逅，潜入梅花党党部盗取（此二处情节显系模仿《一双绣花鞋》）有梅花党人名单的梅花图却告失败。多年后梅花党开始活动……文革中流传的“梅花党”故事（当时并不叫《一只绣花鞋》）甚至把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扯了进去，诬之为“梅花党”党魁。

《一只绣花鞋》的出版和炒作在重庆引起轩然大波，因为重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无人不知《一双绣花鞋》，况浩文认为：“《一只绣花鞋》书中的道具，有关重庆的反特情节，与《一双绣花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汪国真在序中称电影《雾都茫茫》取材于《一只绣花鞋》，而《雾都茫茫》是我根据我的小说创作的剧本。我的作品在1958年就创作完成了，而张宝瑞出生于1952年，难道他6岁就有能力创作长篇小说？”“在‘文革’中，我因为《一双绣花鞋》而受尽折磨，当我被关进牛棚里时，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他的作品？”

重庆文学界对《一双》与《一只》的评论持续了两年。重庆有媒体甚至提出了“捍卫《一双绣花鞋》”的口号。《红岩》杂志有文章认为，《一双绣花鞋》在重庆百姓中可谓家喻户晓，而张宝瑞的书名是在对读者进行误导。张宝瑞当年可能不知道传说的《一双绣花鞋》是谁写的，但他肯定知道这个作品不是他自己写的。他巧妙地把自已打扮成原创者，伪装成手抄本中一枝独秀者，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巧取豪夺。还有论者干脆称张宝瑞为“文坛剽客”。在两书引起争议的两年中，拿着自己珍藏的手抄本找到况浩文的热心老人有60多位，他们都表示，如果况老先生要告上法庭，他们就愿意提供真正的手抄本证据。

令人不解的是，《难》中却作了这样的介绍：“《一只绣花鞋》讲述的是：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中共内部伺机而起。中共特工龙飞设法与梅花党党魁的女儿白薇邂逅，潜入梅花党党部盗取有梅花党人名单的梅花图，却告失败。从此，梅花图杳无踪迹，图上梅花党人名单成为悬秘。十年后，核潜艇设计图外泄、老虎滩出现伪装女士、火葬场闹鬼，销声匿迹十几年的梅花党又开始行动。”接下来的介绍却是：“作者况浩文，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在西南公安部五处任干事，参加重庆3·13逮捕行动逮捕一个女人看到一双绣花鞋，给他留下强烈印象。1957年他据此创作了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1964年初改写成电影剧本……‘文革’开始，电影停拍，但故事情节却被人们传开去，添油加醋，甚至扯上了1965年归国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称其为梅花党成员，高跟鞋里藏有发报机。”（498页）

显然，《难》的作者把《一只绣花鞋》与《一双绣花鞋》嫁接在一起，将二者“合二为一”了，书名和内容是《一只绣花鞋》，作者和创作经过则是《一双绣花鞋》。这样做的依据不知何在？是想调和矛盾吗？不管怎样，作为一部严肃的国史著作，出现这样的失误都是很不应该的。

《难》没有再称张宝瑞为《一只绣花鞋》的作者，却又在接下来的段落里介绍：“张宝瑞是‘文革’时期手抄本小说创作的主流人物，一人写了二十多部，其中《醉鬼张三》最受欢迎，

流传最广……”(498页)这个论断也不知是否有历史依据?当年有名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曾为这一本书坐牢,《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曾为这一篇作品关牛棚受批判。而“写了二十多部”手抄本小说的张宝瑞竟会直到《一只绣花鞋》出版时才突然“浮出水面”,这不是太离奇了吗?《难》的作者在写作这部分时是参考了杨健所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认真看看杨健书中“《梅花党》、《一双绣花鞋》及其它”这一节,杨健在这一节中写道:“在文革中,流布最广的故事还属《梅花党》和《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的基本故事,是指认王光美(这当然是一种诬陷)、郭德洁(李宗仁夫人,当然也是莫须有)等五位著名女领导人,为美国‘战略特务’。所以此故事根本荒诞不经,不值一驳。”据杨健调查,《梅花党》这类故事有不同版本,“说一拨,就是一种讲法,不定就添点什么,去点什么。”没有谁听到过完整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往往信口胡编,节外生枝。有时,甚至将别的故事,如《绣花鞋》也塞入其中。”还有另一个如今被张宝瑞写进其《一只绣花鞋》中的《绿色尸体》,据杨健调查:“这个怪诞不经的小故事,就曾在北京市居民中,在河北石家庄27军,在安徽当涂86医院,在南京汤山第11测绘大队,在广州中山大学等地流传。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第一版第345—346页)

杨健此书出版时(1993年),无人听说过《梅花党》、《绿色尸体》这些故事的作者是张宝瑞。张宝瑞本人也没有站出来宣称自己就是“创作”了这些手抄本小说而且比“梅花党人”还潜伏得更隐秘(因而文革中从未受过迫害、拨乱反正时也从未有人提及)的“主流人物”。《难》的作者现在是依据什么确认张宝瑞“一人写了二十多部”手抄本小说的“主流人物”?是像杨健那样作过大量调查,还是查阅到了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记载,还是仅仅照搬了如今书商的炒作宣传?

◇ 关于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第七章第二节第三小节“‘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中,介绍现代主义文学时,专门介绍了郭路生和他的诗《相信未来》,并且引用别人的评价称之为“‘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甚至高度评价他“相当于惠特曼在美国诗歌中的地位”(492页)。《难》的作者引用这样的过誉而没有作一点分析,看来是基本上赞同的。然而,对于一部严肃的国史著作,这样随意对一位诗歌史上影响并不大的诗人作出如此高的评价,是不是太慷慨大方了呢?

且不说郭路生(食指)的这首《相信未来》在艺术风格上是否称得上“现代主义诗歌”,笔者在这里只想谈谈对该诗的不同理解——早在2000年就已经有论者发表了意见:刘双发表《在《黄河》2000年第一期(总第83期)上的《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一文中,对这首诗隐晦的内涵及其诞生的背景,作了详细深入的考察与剖析,他认为:“《相信未来》是一个利益集团——红卫兵(注:作者本文中的‘红卫兵’指的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联动’一派‘老红卫兵’),在‘文革’年代的代言作。”“诗人食指本人就是联动成员,虽然他没有参与联动的打、砸、抢活动,也没有被捉和被放(他曾经去公安局自首),但是,就情感世界的归属,诗人应该是属于那个青年贵族阶层的。”“诗人对红卫兵运动非但没有丝毫的批判和反思,反而为它的短命夭折而惋惜。他和众多的红卫兵分子一样,沉溺于往日的疯狂,为了失去那终极的肆虐而痛心。”“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经远离中学校园。复活红卫兵运动的希望已彻底破灭。不要说66年的老红卫兵,就是在67年曾经火爆过的北京中学‘四·三’派和‘四?四’派也被冷落了。共和国同龄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已被视如粪土。诗人在68年2月写下的《给朋友》是这样结尾的:‘朋友,请不要用目光问我/这样结束是不是有些突然/只待暴风雨式的生活过去/再给我们留下热情真挚的语言’,这其中欲罢不能的情感是不言自明的。几乎同时期,诗人写下了他的《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是诗人献给无可救药的、已

经死亡了的、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干尸化了的红卫兵运动的挽诗。诗中有叹息，有泪水，有等待，有确信，惟独没有反省和自责。这不是诗人的过错，当时诗人的思想就是那么一个水准。莫名其妙的是：30年过去，这种无悔的情感在以讹传讹的诠释中被描述成一个高尚的、可以被炫耀的情结，真是既荒唐又滑稽。”“红卫兵的理念是混乱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直觉。1967年初，红卫兵运动大势已去。曾经无限风光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一篇与遇罗克的《出身论》进行辩论的长文（注：即《评“出身论”》，见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中极尽全力仍感语言苍白，理屈词穷，无法驳倒遇罗克对反动血统论的批判，于是凭着一种直觉写下了如下意味深长的文字：‘我们不指望从笔墨中赢得自己的胜利，我们要让历史来作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几十年以后的明天。’——这就是非诗歌版本的‘相信未来’内涵的正面直述。遇罗克对这段文字极为敏感，他在反驳文章中写到，如果20年后联动分子当了政，‘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

诚然，刘双的分析和评价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将《相信未来》作者炒作吹嘘为“‘文革’新诗第一人”和“惠特曼”，不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吗？作为一部“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的国史，不是应该在介绍和评价一首小诗的时候更多一些冷静的反思吗？何况，这首诗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历史意义，都远不如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而郭小川这首诗却只在一句话中一笔带过，只称之为“干校文学代表”（499页），这与加在郭路生头上的“‘文革’新诗第一人”和“惠特曼”之类冠冕相比，不是又显得太吝啬了吗？

◇ 关于“李一哲”大字报

《难》在第一章第二节“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崛起”中，提到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书中说：“大字报贴出以后，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中共广东省委把这篇大字报定成‘反动大字报’，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60页）

《难》的作者看来对“李一哲”大字报事件的情况了解不够，或者是虽有了解却表述得不够准确。历史事实并非这样简单。在“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中共广东省委并未简单地把“李一哲”打成反革命集团完事，而是采取了一个至今仍然令人不解的做法：组织广东省委宣传部写作班子“宣集文”写出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文章，同时又允许“李一哲”写出反驳的大字报并公开张贴出去，然后又将“宣集文”的批判文章与“李一哲”的四篇反批判文章一起印成学习材料，发到各基层单位甚至街道居委会组织讨论（笔者当年就曾得到从广州传到重庆的这份学习材料并将李一哲的“四评”全文抄录在朋友中传阅）。

李一哲的这“四评”分别是：《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年12月11日）、《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年12月16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三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年12月27日）、《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1974年12月31日）。最有趣的是，“李一哲”在“二评”中把“宣集文”置于了“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位置上进行批判和嘲弄，其中写道：“‘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写到此处，“李一哲”得意地写了一句：“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

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材料中，前边是“宣

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官样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嬉笑怒骂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一般人读后的感觉就是：“宣集文”被“李一哲”批倒了，而且可以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这是不是“假批判、真扩散”？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困惑不解。这到底是在文革前期一度被打倒、当时又重新主政广东的赵紫阳的特意安排，还是另有“最高”的首肯？有兴趣者不妨对此作一些调查研究。

□ 原载《记忆》第十期 2008年12月28日

~~~~~

# 【当事者言】

## 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

• 杨银禄 •

江青是一个铁石心肠、心狠手辣的人，但她同时又好哭，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她经常以哭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和达到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但我在她身边工作的几年里，有三次看到她真诚地伤心流眼泪。

### 一、为程砚秋流泪

1968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北风嗖嗖地吹摇着无叶的柳枝，天空中飘撒着零星雪花。江青吃过晚饭，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文元同志，一会儿，江青同志到17号楼去看电影，如果你有时间，想看的话，江青同志请你跟她一块看，如果没有时间，不想看的话，也不要勉强。”

姚文元问：“江青同志今天晚上看什么片子？”

“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你们一起定吧。”我回答。

这天晚上刮着小北风，下着小雪，气温比较低。大约九时左右，江青坐着她的大红旗轿车先于姚文元到达17号楼礼堂，警卫员帮助她脱掉大衣，摘掉帽子，解掉大围脖儿，挂在衣架上，她坐在专为她布置的沙发上，护士过去把她的两条腿搭放在沙发前的软脚垫上，把一条毛巾被从她的胸部盖到脚部。

江青刚刚坐定，姚文元就进了礼堂，疾步走到他习惯坐的座位上。按座次排位，姚文元与江青中间还空着一个座位。江青指着那个空位说：“今天晚上，伯达、康老、春桥同志都不来了，文元同志过来坐，坐近点好说话。”姚文元在江青面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人，听江青一说，马上起身挪了一个座位，挨着江青坐下。

江青问：“文元同志，你想看什么呀？”

姚文元礼貌地说：“江青同志想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随你。”

江青就不客气地说：“我想看程砚秋唱的《荒山泪》，你看好不好？”

姚文元说：“好好好，就看《荒山泪》。”并回头对江青的警卫员说：“大周，今天晚上看《荒山泪》。”

在江青与姚文元商量看什么电影的时候，服务人员端上了热茶水，拿来了热毛巾。

两位放映员李云峰、康玉和，技术娴熟，工作细致，不怕麻烦，他们把江青经常看的影片码放得井井有条，说要看哪一部，马上就能取出来，上机，开始放映。老李、小康听到说“看《荒山泪》”几个字，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开始放映了。

一开始，江青与姚文元时不时还说什么话。放映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江青一言不发了，摇头晃脑地看得津津有味。当放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她就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毛巾，开始擦眼泪。

聪明又不解的姚文元，探过头去对江青说：“你如果看这部片子不愉快，就换一部别的片子看看吧。太伤心了，对你的身体不利。”

江青听到姚文元关心的话以后，连脑袋都没有转动一下，就说：“不要紧，我要看，看完它。”

室外的风刮得越来越大了，室内看电影的主人的热情越来越高，越来越入戏、入情、入景了，江青的眼泪流个不停，用过的毛巾扔了一堆。

电影放完了，电灯亮了，江青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哭出了声音，当然，哭声不是很大。可是，在最后一排坐的两三个工作人员都能听得到。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因为大家从来没看到过江青这种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吓得走出礼堂。我和大周、护士走上前去询问、安慰：“江青同志，怎么啦？不要因为看这部电影而伤心，这样对你的身体是很不利的。”

护士说：“江青同志出汗了没有？如果出汗了，咱们去换换衬衣好吗？”

我们一再劝说，她既不说话，也不停止流眼泪。

姚文元对我们说：“江青同志今晚累了，你们送她回去休息吧。”

这时，江青擦干眼泪，停止哭泣，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去看看程砚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问江青：“你想什么时候去看？”

她站起来说：“现在就去，马上就走。”

我劝她说：“现在就走不行啊，我们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天又这样晚了，天气又不好，刮着风，下着小雪。等我们了解到她的准确地址，再去也不晚，请你改一个时间吧。”

江青说：“我下决心决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了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着觉，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快去打听，我等你们一会儿。”

北京城这样大，又是夜深了，找一个从来没有去的家庭地址谈何容易。

江青执意要去，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有意提示姚文元，请他劝劝或许有点作用：“文元同志，你看今晚这么晚了，天气不好，江青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今晚还叫江青同志去吗？”

姚文元听懂了我的意思，就含笑对江青说：“小杨讲得有一定道理，要不就改一个时间，今天这样晚了，夜间找人不方便。”

江青不高兴地瞅了他一眼，说：“今天晚上谁说也不行，我非去不可了。”她指了指姚文元，说：“今天晚上，你也和我一起去，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想，我们的确不能再说什么了，如果再说什么，就要倒霉了。于是，我对她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下了决心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我马上去了解一下她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了，我们就出发，请你稍稍在这里等一等。”

江青一挥手，说：“去吧，快去了解，越快越好。”

我就在17号楼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秘书打通了电话，请他叫北京市公安局查一查程砚秋家的住址，马上告诉我，越快越好。

那个时候的机要秘书保密观念特别强，知道的绝对不说，不知道的绝对不问。所以他没有问我查程家的地址干什么。就立即通知了公安局查找。他们的办事效率还真高，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查到了程夫人的家庭地址，并及时通知我了。

这时，已经到了深夜11时50分左右了，我报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门牌号码以后，她说：“我马上去。”

我说：“现在时间已经进入深夜，你的随车跟在你坐的车的后边，我把吉普车开过来，我在你前边带路，查找程家的门牌，如果叫随车上的同志找，会影响你的安全。”

江青说：“你说得对，快去开你的车来。”

午夜12时，我们从钓鱼台出发。因为是冬夜，又到了零时时分，天刮风、下雪，那时，人们也没有夜生活的习惯和条件，所以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那条要去的街道，但是门牌就难找了。那时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我们叫老百姓的门问路，他们有的不答话，有的答话却不敢开门。我敲一家的门，里边答话了：“你们敲门有什么事？”我说：“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想打听一下，程砚秋的家离你家有多远？是在路北还是在路南？”

门里一个老大爷说：“什么，解放军？冒充军人的多啦，程砚秋是一位名人，天这样晚了，你们现在找他家干什么？”

这位老乡可能还认为我们是要抄程砚秋的家呢。怎么叫也不开门。江青的车在马路上停着。我真的有些心急火燎的，就对门里说：“老乡，我们不是坏人，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有一位领导干部很惦记程砚秋的夫人，想去看看她，快点告诉我们吧，求你了。”

当时八三四一部队是中央派到六厂二校支左的部队，经常在报刊上介绍八三四一部队的支左经验，所以，这个部队的代号是家喻户晓的。门里边的老人听到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人问路，立刻把紧闭的门打开了。那位老人带有歉意地说：“你们早一点说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我早就打开了，我们知道你们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部队，我们不会怀疑你们。我告诉你们，程砚秋家在路北，从这里往西走，再过五六个门，就是程家，你们去吧。”

我又恳求说：“老大爷，天这么黑，我们又没有来得及带手电，还是不好找，帮人帮到底嘛。请你上我的车，带一段路怎么样？”老人爽快地说：“行行。”我给他打开车门，他很快地上了车。走了大约有60米左右的距离，老人就说：“停车，程家就是这个门，”

我下车报告江青：“程砚秋夫人就住在这个院里，进去吧。”随车人员叫开程家的门，江青、姚文元等随行人员除留下两个看车都进院了。

我对老人说：“老大爷，谢谢你给我们带路，我开车把你送回去吧。”

老人客气地说：“不用谢，也不用送，我自己走回去，就几步路，没有事儿。”他贴近我的耳朵小声问：“中间那位女同志是江青同志吧？那位胖胖的，个儿不高的，是姚文元同志吧？”

我心想：“这老人，好眼力，天这么黑还能看出人的轮廓和大概模样。”为了保密，我说：“老大爷，不是的，你看错了。”

说完，老人就走了。

我到程夫人屋里，在灯光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

程砚秋家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院内整理得很干净。北房是正房，一进门是一间客厅，北墙根有三个旧式木制沙发，一大两小，一个长茶几也是旧式木制，西墙根摆放着一个长条案，上边有两个大花瓶，花瓶内各插一个鸡毛掸子，东墙根有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桌子上没有摆放什么，看样子是吃饭用的，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古色古香的，三面墙上挂着一些条幅和国画，没有注意看是不是名家字画。小客厅布置得很雅致、温馨。

我们是把程砚秋夫人从梦乡中叫起来的，看到红极一时的江青和姚文元到了她们家，程夫人特别高兴，紧紧握着江青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坐下后，还是江青先开口，非常亲切地问道：“你的身体好吗？”

程夫人说：“还可以，大晚上的，外边又刮着风，天气这么寒冷，江青同志还到我家来，不敢当呀，实在过意不去。”

江青的突然到来，程夫人一时还搞不明白来意。看来老人的心情又紧张又激动，手忙脚乱地泡茶倒水，很不自然。

这时，江青已经看出程夫人精神紧张，就解释说：“你不要忙乎了，今天晚上，我和文元同志主要是来看望你的，请你坐在我身边来，我想跟你说说话，一不要客气，二不要紧张，平平静静地拉拉家常好吗？”

程夫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直点头。

江青问：“你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生活来源是什么？”

程夫人说：“我的生活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困难，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程老先生存款的利息，虽然不高，还够吃饭的。请江青同志放心。谢谢江青同志对我们的关心。”

江青又问：“程砚秋同志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金银珠宝手饰之类值钱的东西吗？”

“有一点，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程夫人难过地说。

红卫兵抄家，江青是知道的，这种不法行为江青也曾支持过，抄家风是文革中号召破四旧时掀起来的。当然，这和她是有关系的，于是她就把话岔开了。

她说：“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并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对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你有没有保留他的剧照？”

程夫人兴奋地说：“有有，就是剧照没有被红卫兵抄走，我藏在了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能不能拿出来叫我们看看？”江青说。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程夫人起身走进东边的里屋，把几个大影集，从大箱子、小柜子里找出来抱到客厅，摆放在大茶几、条案上，供江青、姚文元翻看。江青按照程砚秋的年龄从小看到老，一本一张都没有放过。一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夸奖：“好哇，影集很精致，剧照更精致，这可是宝贝呀，这是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可以进入中国艺术博物馆的，精心珍藏起来，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博物馆。”她拉着程夫人的手说：“还是由你保存吧，你是最有资格保存他的珍品的。”

江青看完剧照以后，对程夫人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泪》的时候，由于剧情的发展和程砚秋的表演艺术，使得我流了眼泪，同时，也为程砚秋同志这样优秀的艺术家离开了他喜爱的舞台，离开这个世界而难过。”江青说着说着，眼泪又要流出来了。她接着说：“高兴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又看到了程砚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不同时期的剧照，好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

临走的时候，江青对程夫人说：“请你保重身体，为程砚秋同志好好活着，祝你健康长寿。”

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车上，并说：“请江青同志保重，请你为我给毛主席带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江青为何对程砚秋如此喜欢呢？据说程砚秋认为江青是一个“知音”。我看到章诒和回忆程砚秋的文章说：“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两个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1点到5点多，始终没有见到江青的影儿。翌日上午10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363页）

## 二、为谢富治流泪

谢富治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非常复杂，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党的八大时选出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权力很大。谢富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之一。江青对谢富治很看重，看重的原因，根据我的看法，主要是谢富治和江青观点一致，又听江青的话，江青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江青担心别人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上海一些不太光荣的历史，想把有关那些历史的材料清除干净。叶群找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其心腹江腾蛟，派人假冒红卫兵到上海抄了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谢富治就参与过对抄回材料的处理。

谢富治虽然是军人出身，打仗勇猛，但是，他的心还是蛮细的。1971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他看到江青对照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几乎发展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谢富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天，他到钓鱼台10号楼对江青说：“江青同志喜欢照相，我支持你，这项活动既可以锻炼身体，松弛一下神经，又可以学习照相技术。但是，你的身体不适宜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太长了，活动时间太长容易感冒。如果在室内搞一个摄影室就好了。摄影时，你身体好的时候，想在室外就在室外，觉得身体不适合在室外，就在室内。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给你在10号楼布置一间摄影室好不好？”

江青一听就很高兴：“还是富治同志的办法好，你想得很周到，谢谢你为我的健康和兴趣着想，听你的，请麻烦你给我打一张大背景布，我喜欢天蓝色的，白的也行，还是天蓝色的更好，找4个至6个照相用的灯就可以了。”

过了三天，谢富治亲自将江青要的背景布和灯具送到江青的住地，并亲自安排人布置。布置好了，江青很满意，高兴地对谢富治说：“你不愧是军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又快又好。不好意思劳你的大驾。”

谢富治临走的时候，江青一再对他表示感谢。谢富治说：“谢什么，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小事吗？”

江青夸奖谢富治，同时批评我们说：“还是你想得周到，我的工作人员就没有想到，他们如果像你对我这样，主动想工作、做事情就好了。”

这时，谢富治还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他们也不错，做了不少工作。”

谢富治给江青精心布置在10号楼的摄影室，利用率极高，江青有段时间天天搬弄她的照相器材，天天给别人照相，玩得很开心。

后来，江青嫌这个摄影室小了一些，又请谢富治在17号楼搞了一个，林彪的《孜孜不倦》，就是在那里拍摄的。

更使江青感动的是，谢富治给她布置摄影室的时候，已经患了癌症，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当江青获悉谢得了不治之症以后，难过得流了眼泪。她说：“富治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威震敌胆，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党忠心耿耿，乐于助人，带病给我布置摄影室就说明了他的思想品质，从这一点说，我觉得对不住他。病魔是无情的，我救不了他，只有请医护人员能够延长他的生命，我是无能为力的，愿他能够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

江青亲自到医院看望病人，以前我没有发现过。谢富治病重住院后，大约是1972年的2月份的一天，江青亲临谢的病房，安慰他：“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痊愈，和我们一起战斗。”

江青到医院看望的时候，谢富治已病入膏肓，听了江青安慰和鼓励的话，只是点点头，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水。

江青从谢富治的病房出来，难过得忍不住流泪了。

江青给谢富治精心拍摄过一张彩色相片，放大成24寸。谢富治得到照片时，非常高兴地对江青说：“照得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去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遗像。”

一向不开玩笑的江青笑着说：“你可要事先告诉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到时别用错了。”想不到开谢富治追悼会时用的遗像果真就是江青为他照的那一张。

3月26日，谢富治医治无效去世，江青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几天无精打采，饮食减少，睡不好觉，也很少说话，摄影停止，打扑克停止，看电影看一会儿就看不下去了，换了一部又一部，换哪一部都无法让她静下来看完。中央政治局开会，她也不想参加，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不想参加了，向总理请个假。中央讨论决定了什么重大问题，请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就行了，或叫春桥、文元同志到10号楼转告我。”

有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

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她打铃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

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

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

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

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

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人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用哭泣腔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

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车。

### 三、为陈景润流泪

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我国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体是这样写的：

陈景润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钻研，进行了无数次的运算。他把全部心智贡献给了这道很多外国数学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难题。他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反映非常强烈，被外国著名数学家称之为“陈氏定理”，一个外国科学家给陈景润写信说：“你移动了群山！”

就是这样一位被外国科学家交口称赞的伟大数学家，学习、工作、生活的条件太糟糕了。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间，这个小小房间还缺一个角，原来楼下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3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窗子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小屋空荡荡的，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4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他的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记者觉得屋内光线太暗，拉电灯绳想打开电灯，但拉了几下灯也没亮。陈景润告诉记者，有人用老虎钳子把我这个房间的电灯线较断了。我看书就点煤油灯。他笑着说，不要电灯，电灯麻烦，用煤油灯一样工作……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

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得很。

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我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看到了，我还看得很仔细呢。”我回答。

“你有什么感受吗？”江青试探性地问。

“陈景润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数学专家，他的运算成果，不但对我国的数学领域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太差了。”我说。

我不知道江青问的是什么意思，是想叫我说陈景润的好话？还是想叫我说他的坏话？一时



难猜透，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地说了我的真实看法，然后，想听听她怎么说，不过看她的样子，是在同情陈景润，要不，她为何流眼泪呢？

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擦眼泪，也许我的话使她更加激动了。

她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她说了这些话就叫我离开了。

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我问她：“叫他到10号楼还是到17号楼？”她说：“快，快叫他到10号楼来。”

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相当于科教部的副部长。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立即给迟群打电话，因为我以前没有跟迟群直接联系过，所以不知道他的电话，我就通过39局总机找他。当时，39局总机是全国服务态度、业务水平最好的总机。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接通了迟群的电话。迟群原来和我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很熟悉，通话以后，他很客气地问我结婚了没有？身体好不好？拉起家常来了。我说：“迟科长（原来他是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科的科长，我对他还是称原职务），你别问这些了，江青同志叫你快到她这里来一下，她有紧急的事情跟你说，我们现在在钓鱼台10号楼，我已经通知钓鱼台东门的哨兵了，快来，请不要耽误时间。”

他解释说：“我手头上还有一件事，等我办完了马上就到。”

我催他说：“什么事是轻重缓急你是清楚的，先到这里来，你的事回去再办好吗？”

他问：“老杨，什么事那么急？”

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在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不要浪费时间了，快来吧。”

我从江青办公室出来，查电话，在电话里说来说去，已经20分钟过去了。江青等得着急了，打铃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生气地问我：“迟群现在怎么还没有来，看来他对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我解释说：“不是，我以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是叫总机查到的，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他马上就到，请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在楼厅等着迟群，半个小时后，他风风火火地来了。

我到江青办公室报告：“迟群同志来了，你看在哪儿谈？”

“我出去就在门厅谈，事情紧急，就不要讲究什么谈话形式了，谈完了叫他赶快去办。他这个人办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厉风行。”

说着，江青拿起那份《清样》就很快到了门厅。江青看到迟群，没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她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迟群表态：“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着急地挥手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载《北京日报》2008年12月5日），文中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医院。

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的周到细致的安排，也有江青的过问，科学院、医院的具体工作，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摘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未定稿《杨银禄谈江青》。作者曾于1967年10月至1973年6月任江青机要秘书。

□ 原载《记忆》 第十一期 2009年1月11日

~~~~~

【人物春秋】

程世清沉浮录（下）

• 李意根 •

◇ 九一三事件前对毛泽东一语惊天：“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和林彪蜜月关系的结束始于九一三事件前夕。

1971年8月30日晚9时许，毛泽东南巡从长沙到达南昌，驻八二八招待所。南昌八二八招待所在向塘机场附近，原是空24师师部，后仿照武汉东湖和杭州刘庄的“行宫”而建，环境和设施很好。9月1日晚餐时，汪东兴对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说：这两天，主席休息得很好，这里的条件不错，主席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你们多弄点野兔和斑鸠。程世清等人听了很高兴，随即作了相应安排。

毛泽东这次南巡，意在为最终解决庐山会议问题（实质是林彪问题），继续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当时毛泽东把南昌作为这次巡视途中的一个节点，召许世友（南京）、韩先楚（福州）赶到南昌，对许、韩、程一起进行谈话教育。

当天（8月30日）在车上，毛泽东就找程世清等人谈了话。会谈直指庐山会议问题，点名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暗示根子在林彪，并以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讲清各自的问题，跟林彪划清界线。在与程世清谈话时，毛泽东问他：“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其他人身上了。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突发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冒死向毛主席报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面见了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接着便对汪东兴谈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并请汪东兴代为向主席报告。汪东兴听后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随后，程世清即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讲了以下内容：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到我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8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面，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程世清在回忆录中（秦城监狱中所写）记述了他汇报完后的心情：“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9月1日毛泽东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过中饭，大家刚躺下午睡，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等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招招手，登车而去。

过去，毛泽东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规律的，保障工作依预案进行，这次却很反常，突然决定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这是为什么？从逻辑上判断，应当是9月2日毛泽东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对林彪和四员“大将”的问题及动向，作出了新的判断和决策，必须紧急返京，抢得先机，从容应对。程世清在关键时刻，一语惊天，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果断地解决林彪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论，兹人兹事，历史应当书写一笔，以示公正。

此事还有一些后续情况：

1971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为查清洪都机械厂生产的70多架强五飞机疏散问题，打电话给文道宏（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就好了。此事是韩先楚同志（时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当时归福州军区管辖）向我提出来的，我不得不亲自过问，望你们理解，不要有什么压力。这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电话转告程世清同志（总理的电话原本是打给程世清的，因程下乡，经总理同意由文接听）。”总理说的“起了作用”，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

1972年3—4月，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举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当时在南昌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讲了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讲了，当时离开你以后，我就到主席那里讲了。对于程世清讲的这些情况，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

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连张春桥也没有吭声。

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的张耀祠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证实了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一事。

◇ 银铛入狱10年，临终身份证件皆无

有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几天的情况，程世清在其回忆录有如下的说法：

9月19日晚上10时许，总理来电话（保密机）通知我说，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并说，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报告的事，主席曾要你亲自报告我，对别人都不能说是吗？我对总理说，我准备在这个月底到北京单独向您报告，总理说：“事情现在已明了，主席要我打电话感谢你。”听到总理的电话后，我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并且感到了一种从未有的高兴。

此后数日，奉毛泽东命，许世友要程世清到南京，拿一份绝密文件，送到福州韩先楚处，又从福州乘坐“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的高级专列，顶着星光返回南昌”。然而，程世清后来回忆道：“事情也不知为什么那么巧，回到南昌，我刚进家门不久，汪东兴就打来电话对我说：要我到鹰潭一个仓库去，动员周赤萍（时任福州军区政委）到北京去。我问他，这是谁的意见呢？他支吾了一大阵子，才说是总理的意见。我对他说：军区那么多的人，我凭什么本领，能把那个大政委送到北京呢？我干脆回答说，另选高明吧。汪又接着说，主席在南昌同我的讲话他没有作笔记，让我追补回忆，把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交给他。我当时回答，我那时根本就没有作笔记，现在更无法追忆整理。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我曾想：你那个专管的大主任，怎么想得出来要我来办这无法做到的事情呢？真不知为了什么‘打算’。”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程世清继续做他的省委书记。半年后的1972年4月27日，中央下发中发〔1972〕17号文件，给了程世清这样一个定性：“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这时的程世清仍然被称为“同志”，省委书记的职务也没有撤掉。直到当年6月28日，程世清才被隔离审查。个中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文革结束后，1978年10月23日，程世清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期间，程世清蛰居斗室，伏案写成了30万字长篇小说《柴山堡故事》，原稿以圆珠笔芯裹胶布书写，字密如麻。书中故事源于他儿时家乡生活原型，上百人物如郭永泰、赵文品、李婶、甜妹子、郭不理、郭二皮、陈六祖、陈四瘸子、汪老虎、王文焕、小寡妇、包大脚、石杆子、杨万油、扁担老人、罗六姑、路走高、胡裹糊、白梅香、丁四苗子等，维妙维肖，乡土气息扑面而来。1981年三、四月间，程世清写就了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录，成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982年1月，坐牢3年多的程世清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向其宣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82）军检免字第7号《免于起诉决定书》。该《决定书》宣布：“被告人程世清，男，现年六十四岁，河南省新县人，汉族，小学文化，一九二九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五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逮捕，现在押。被告人程世清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于起诉……”

有意思的是，程世清因为被称为林彪集团在江西的代理人而备受指责，甚至锒铛入狱，而在这份《免于起诉决定书》中却根本没有提到程世清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程世清不能够算做是林彪的死党。更有意思的是，8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曾对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和事进行过一次“清理”，程世清不在“落实政策”之列。比起曾被算做是林彪死党的其他人来说，程世清以后的境遇要差很多，1988年中央军委特授“红旗勋章”时，林彪系很多人都在其列，但没有程世清。

程世清与“四人帮”关系并不好，也看不起他们。有3件事可以说明。其一，据著名传记作家吴东峰2002年10月20日在福州对程世清本人的采访：在庐山会议期间，陈云发言论及生产。王洪文听了很不满意，批评道：“老右派要翻案。”程世清当时非常生气，斥责王洪文说：“新兵蛋子懂个屁！”其二，林彪线上的另一红人——空5军政治委员、浙江省委书记陈励耘后来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初期，林彪集团策动了对张春桥的批判。以后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华东大组再开讨论会的时候，原来积极发言批判张春桥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只好检讨。那次华东大组会议江青也参加了。陈励耘还没讲完，张春桥指着陈励耘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也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此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噤若寒蝉，不敢吭气，程世清却站了出来打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世清这一番话算是把江青、张春桥得罪到家了。其三，在秦城监狱期间，程世清与姚文元、刘丰、王秉璋同居秦城监狱一室。程世清曾对传记作家吴东峰说：“（姚文元）只知道看书，有时也下下棋，但什么话也不说。他是个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主要是听了康生、江青的话。”

1982年3月21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程世清退出现役，每月发200元生活费，政治、医疗按师级干部待遇转地方安置，11月6日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转业后的程世清居住在福州北大路某院内，其院名“半野轩”，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故宅，程世清居一角，取名“野半庐”。晚年的程世清有两大爱好，一是潜心学画，他作画时喜欢以白布代纸，经常画些奇松怪石、飞禽走兽等等，据看过的人说画得很不错；二是特别喜欢喝酒，60岁每日1斤，70岁每日半斤，80岁每日仍3两，而且喝的都是竹叶青等烈酒。

程世清虽然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无论他在福建还是在江西期间，地方官员都对他非常敬重。1992年2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来到“野半庐”探望；作为曾于1969—1971年下放到一机部江西奉新“五七干校”劳动的贾庆林，对当时主政江西时的程世清记忆犹新。他和程世清忆及当年时说：“听将军作报告，手不拿稿，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滔滔不绝数小时，谁能信您只读过一年私塾？”1996年3月，时任福建省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野半庐”探望。2003年10月，江西省南昌市委书记余兴荣、南昌市市长李豆罗来到程世清在南昌的住所看望。

2008年4月29日下午16时49分，因病医治无效，程世清在南昌逝世，终年90岁。

由于当年程世清不愿回江西安置，一直留在福州，由当地部队代管，身份问题一直挂着难以解决，临终前没有居民身份证，也没有军官证和离退休等证件。

程世清逝世后，在家属的努力下，总政干部部承认程世清享受地、师级待遇，并同意由属管单位在江西和福建两省的有关报纸上刊登讣告。9月初，经主管单位同意的家属刊登的讣告

文字内容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三八八一部队讣告：程世清，1918年7月出生，1929年7月参加红军，1935年3月入党的中共党员，2008年4月29日病逝于南昌，享年90岁。”落款为“刘秋萍（程世清夫人）携家人”。

□ 《文史精华》 2008年11期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